

辽金元文学研究

李正民 董国炎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辽金元文学研究

李正民 董国炎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元文学研究/李正民,董国炎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5

ISBN 7-5039-1882-9

I. 辽… II. ①李… ②董…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6026 号

辽金元文学研究

李正民 董国炎 主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一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388, 000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39-1882-9/I·790

定价: 27.00 元

序 一

邓绍基

大致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越来越重视“补空白”的研究工作，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所谓“补空白”，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加强薄弱环节是同一个意思，指的是以往较少或很少有人研究的文学史领域。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百年以来，与先秦、汉魏六朝文学和唐宋文学的研究情况相比，辽金元文学（元杂剧除外）的研究就属薄弱环节。这种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史著作中，也就影响到文学史教学。我曾遇到一位中文系的大学生，他可以对唐代诗歌的分期和发展情况，说得头头是道；他也可以对宋诗的演变和特点，讲来如数家珍；甚至对明、清诗歌流派，他也可以按照时间次序，从“台阁体”、茶陵派到公安、竟陵派；从“神韵说”、“格调说”到“性灵说”，背得滚瓜烂熟。但对金、元诗歌的特点和文化，他就很感陌生了。

其实，我自己也何尝不然。我主编《元代文学史》时，深感可供参照的元诗研究积累，实在太少。前人大致都说元诗学唐，至于这学唐的种种具体情况，却很不了然。在时间和条件

许可的范围内，我当时尽可能阅读了一大批元人诗文集，才勉强地对元诗学唐的始因、特点和前后期的变化，作了一番梳理，却又大感到述说粗浅，很不深入。为了论说元诗，又必须涉及金诗，于是我又读了一点金诗，找到也影响元初诗坛的一种传统因素。但同样也感到述说粗浅，很不深入。

1994年，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周惠泉同志的《金代文学学发凡》杀青付印，嘱我写序，我在序中说：

我对金代文学缺乏研究，但在主编《元代文学史》的工作过程中，深感如果不深切了解金代文学，就很难贴切地说明元代文学的若干重要现象，即以元代诗坛的“举世宗唐”之风来说，期间一个传统因素就是继承着金代诗坛的“直以唐人为指归”风气。同样，元代散文领域中出现的古文理学合一观点，在金人的文论见解中也有反映，王青雄就说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如果把这种见解同元末戴良的“摘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相观照，使人有何其相似之感。当然，在这类问题上，重要的还不是找出它们的相似之点，也不只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有无继承、影响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这种观点由宋到金再到元的发展过程，探讨它们的同与不同，也就是同中有异的内涵，从而有助于深入地说明具有规律性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命题。

是的，我在《元代文学史》中只是论述了金、元诗的相似之点，只是具体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影响关系。至

于“探讨它们的同与不同，也就是同中有异的内涵”，在我执笔的《元代文学史》的有关章节中很少涉及。究其缘由，只为研究不深。所以，序文中那段话，原是针对我自己而发的。

《金代文学学发凡》出版后不久，从诸多方面得知，山西省不少学人正从事辽金元文学研究，并可形成研究中心。1996年，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董国炎同志来京，枉驾寒舍，多有交谈，得悉山西大学中文系已把辽金文学研究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使之形成特点，汇成中心。我为之振奋。因此，当国炎同志说起即将编辑出版《辽金元文学研究》论文集并嘱我写序时，不辞谩陋，当即允诺，正是受我的振奋心情所驱使。

今年5月，李正民同志为送论文集软盘，专程来京，并携来国炎同志书信。我注意到这个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涉及方面颇广，即以金代文学来说，既有概论性的论文，也有诗歌流派、词史和辞赋研究。就论文的内容而言，既有宏观论述，也有实证考索。丰富多采，迭有新见。至于向来不被冷落的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这个集子中收有7篇研究论文，也见出新的取向角度。我所尊敬的前辈专家姚莫中先生的关于元好问的大作，更足以使这本论文集增光添彩。

正如国炎赐函中所说：“所有论文都颇认真。”“认真”，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治学态度。我常想，学问根底有相异，治学态度无不同。相对于渊博精深的前辈学者如姚莫中教授而言，吾辈差距，难以道里计。但姚莫中教授认真治学，吾辈同样也认真治学，那就大有希望了。这也是我由这个论文集中得到的一种重要的感想。

研究辽金元文学，不断地产生研究成果，而研究成果的产生与研究专家的涌现，大致是同步的。已有的研究专家，加上新涌现出来的研究专家，那么，辽金元文学研究中心也就越益

发展，越益坚实了。

记得数年前惠泉同志书中，嘱咐我撰写文章，“支持”正从事开拓辽金元文学研究的山西学人。我很惭愧，由于多年来总是工作头绪繁多，忙忙乱乱，辜负了友人的嘱托。其实，如我浅学，安敢谈论“支持”，只能表达钦佩和学习之意。我想我的这篇小文也正是表达我向山西大学的学人们学习的心情，并祝愿他们获得更多更好的业绩。

以上云云，权为序文，不当之处，恳望大家不吝指正。

1998年夏

序 二

姚奠中

辽、金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是比较冷落的，元代文学除杂剧词曲外，也是比较冷落的。从时代上看，辽代略与北宋相当（从辽太宗定国号为“大辽”（947）起），金代略与南宋相当，元代则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分裂。合起来辽、金、元共达三百余年。两宋文学之富，数量上可以说超唐迈汉。研究者之多，自有必然。而辽、金、元为少数民族政权，又经多次战乱，文化相对落后，也很自然。但这三个政权建立后，统治者都加速了汉化，而一般文学作者又大都仍是中原人士，他们既沿袭了中原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其文学也同样继承唐、宋。作为中国文学的总体，这几百年的文学史，绝不应予以忽视。山西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把这一段定为重点学科中的重点，原因即在于此。

十多年来，我们以元好问研究为起点，展开了工作。先增补、修订、校定了《元好问全集》，于1990年1月出版。主持了两次全国元好问学术研讨会，除全国和国外友人的论著外，我们的论著也颇丰富。当前正扩大范围承担了《全辽金诗》的

收集、整理、编纂工作，已经完成，并将为编纂《全辽金文》作准备。同时还承担着《中华大典》中的《戏曲艺术典》的主要编纂任务。这些基础工程，已通过和将通过集体努力来完成。尽管我们已进行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以为研究一代的文学，必须从时代的全局出发，必须掌握两个要点：一、全面掌握史籍，二、全面掌握文籍。首先着眼于《辽史》、《金史》、《元史》。而各史情况不同，不能单纯依靠。《辽史》编写，质量最差。清代厉鹗的《辽史拾遗》有所增补，虽仍不理想，但也只能如此。《金史》，是在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刘祁的《归潜志》基础上写的，特别是元著，作用最大。《四库全书提要》对《金史》作了很高评价。《元史》资料丰富而芜杂，问题不少。好在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绍忞的《新元史》，足以补正。另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上接《资治通鉴》下迄元代的一部编年史——包括宋、辽、金、元四代，和《辽史》《金史》《元史》同样重要。再参以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书对三史的纠谬、订误、评议，便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当时的史籍。

其次掌握文籍，要着眼于辽、金、元三代的所有论著。有趣的是：辽、金、元三代存世的文籍，在数量上和它们占领中原地区的大小成正比例——辽只占中原的“幽云十六州”，文籍最少；金占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文籍较丰；元统一全国，文籍最富。另一面，文籍和它们建国年代的长短成反比例——辽 188 年，最长（如果连契丹阶段，就更长了），文籍极少；金 120 年，较短，文籍却较多；元 99 年，最短，而文籍极富。说明文学、文化，始终集中在中原地区，政权年代的长短，关系不大。《辽史·文学传》列名七人，而著作全佚，只有

杂著四种存留。幸有清季缪荃荪的《辽文存》、王仁俊的《辽文萃》收集了零散单篇散文不少，而近人陈述的《全辽文》，经四十年的努力，收集到散文八百余篇。尽管其中最多的是佛教文献，但已经是了不起的贡献了。《金史·文艺传》列名 23 人，赵秉文、王寂等大家尚不在内；元好问《中州集》所列诗人小传凡 219 人。金代作家可知者真不可谓不多了，但《四库全书》中金人集却只有五部，其他杂著也只有十几种。清代庄仲方辑有《金文雅》，张金吾辑有《金文最》，连康熙五十年敕编的《全金诗》，资料已不算少。而全面的总结性的整理，正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元史》只有两卷《儒学传》，而没有文艺或文学传。但传世的诗文集，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 169 部。其他杂著、词曲、杂剧、小说之类还不算。元代诗文总集，已有元虞集的《皇元风雅》和苏天爵辑编的《元文类》，而清顾嗣立的《元诗选》（分一、二、三集。每集一百家）和张景星辑编的《元诗别裁》，收集的就更多了。

从上所举的史籍，可以基本掌握辽、金、元三代的历史概况。对所举文籍的清理，则还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收辑、增补、校订，而专家、专著、专题的研究当然会交错于其间，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继续进行、长期进行的任务。这本《辽金元文学研究》，收入的 40 篇单篇文章，只是对辽、金、元文学的初步探讨，还没有纳入系统钻研。为了便于相互交流，印了出来以供参考。本人已行年八十有四，从去年冬天起，已正式退休，已不参加研究工作。但对这一事业的关怀，仍与往日不殊。在这里仅就自己想到的问题，缕述如上，不像是这本“论文集”的序，只可以说有些关联而已。同仁们如以为可，那就姑且置之卷首。

序 三

董国炎

辽金元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特殊意义，值得深入探索，理应成为一门显学。

这样说的根据在于：辽金元文学，除负载自身文学价值外，还负载深厚的民族学和文化学意义。内涵的丰富性，超过了很多时代的文学。剖析辽金元文学，既是文学上深入这片尚待开垦的领域；又是从新的切入点进入民族学和文化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由宏观视野的扫描，去接近我们的研究对象。

一

在世界历史上，民族问题一直是历史舞台上重要的又严酷的角色。多少国家的分裂兴衰，战火的燃起蔓延，民众的痛苦流离，直接与此相关。二次大战前夕和二战期间，民族优劣学说盛行一时，犹太民族和其他所谓劣等民族在血泪中呻吟。纳粹政权垮台后，人类学和民族学受到普遍重视，得到长足发

展，不是偶然的。二战后民族学的主流是驳斥民族优劣学说，然而时至今日，在前苏联，在东欧，在非洲，在中东和世界很多地方，民族歧视、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直接联系着战乱冲突和国家分裂。

在世界史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是一个特例。当世界很多古老文明趋于式微之际，中华文化仍然表现出勃勃生机，旺盛生命力。古老中国屹立世界东方，历经五千年风雨而日益昌盛。中国民族是诸多民族逐渐聚拢融和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显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质和引人注目的凝聚力。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凝聚力，其学术价值，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可谓无穷无尽。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三次民族融和和高峰引人注目。第一次在先秦，所谓苗狄夷戎诸族，有不少融和于夏商周和春秋诸大国，共同形成其后不久的汉族。

第二次在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北魏齐周诸多政权下，民族融和进展很快。据《齐书·江总传》，当时“关中居民百万，戎狄居半”。到隋唐，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已与汉族融和无痕，这次民族大融和，促成了隋唐时代崭新的繁荣昌盛。

第三次融和高峰期在辽金元，余波所及，实达明清。正是在这次高峰期，中国历史上幅员最辽阔的蒙元帝国出现。

每一次民族融和，都有当时的血泪阵痛，有社会发展的暂时停滞甚至倒退，但最终却培养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活力。其中的损失与补偿，痛苦与欣慰，值得深思。中华民族富于凝聚力，中华文化富于包容力生命力，内在机制是什么？运行规律如何？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结论和论据都应当回到历史环境中寻找。因此，每次民族融和期的文献资料，都弥足珍贵。可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相关资料，数量不多。与前两

次民族融和的高峰期相比较，辽金元时期的文献资料数量多，考古实物数量也多，历史面目较为清晰，民族学研究价值最高。

二

在文化学意义上，研究中原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研究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研究中华文化的形成及其凝聚力，同样是意义非凡的课题。

中国与古埃及等并称世界四大古老文明发源地，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不能有力支持这种论断。譬如在古埃及，考古发掘证明了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中国的考古发掘，长期不能证明这样久的文明史时段，例如母系氏族文明和图腾文明就缺乏很有力的证明。因此，中华文化的性质曾受到怀疑。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来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换言之，中华文明相当于巴比伦文明的一个分支，一个派生产物，父系氏族时代自西亚迁徙而来。黄帝西来，黄帝为胡人，炎黄之争是西来部族打败土著部族等等说法，都被与此联系起来，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世纪 80 年代，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北方地区，考古发现对上述历史疑问作了石破天惊式的有力回答。这就是辽宁西部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1986 年 7 月 25 日《光明日报》发表卜昭文等题为《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的重要文章。文中说：

“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夏以前

阶段将不是只有传说，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

红山文化的发现及一系列相关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双重价值：对外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对内否定了中华文化单一中心说。中华文化单一中心说认为：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文明由这个发祥地向四周幅射扩展的过程。

红山文化遗址以其规模之宏大与独特，充分反映这里又是一个文化中心。女神庙与祭坛有宏大规模，令人想象那具有国家雏形的文明社会的情形。怀孕妇女陶俑反映出生殖崇拜观念。当时社会形态可能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期。还值得提出的是关于龙的图腾。今人好谈龙的国度，龙的传人，但“龙”到底产生于何时何地？产生于何种文化背景下？过去，考古学界公认的“龙”的形象最早见于商代青铜器上，至今只有三千五百多年时间。在此之前的情况则付阙如。红山文化区（辽宁西部地区 and 内蒙东南部地区）近些年接连出土“龙”的文物，使我们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

这些文物包括龙形玉器和龙纹陶器。玉器距今五到六千年，主要有：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碧玉龙；东山嘴两端均雕龙首的玉璜；牛河梁玉龙。陶器的时间距今七到八千年，代表作是敖汉旗兴隆洼龙纹陶罐。其龙的形象为猪首蛇身鱼鳞纹，形象富于动感，龙身周围有云形纹饰，似乎游行于浮云流水之间。如果以此推测，龙文化的产生应当联系着养殖业捕捞业唱重头戏的生产方式，且联系着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当原始狩猎为主的时代结束后，养殖就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妇女成为主要劳动力，社会属于母系氏族时代。猪在养殖动物中，是最主要的一种。猪的生活习性，易于饲养，其繁殖能力

较强，每胎产仔都超过马牛羊之类。猪在春秋以前深受重视，出土墓葬，常见古人以猪骨陪葬，可能视其多寡表示财富和身份，且有装饰意味，以此为美。当时草原茂密，河流纵横，鱼类是捕捞对象，蛇类影响人畜安全，都同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可能成为图腾对象。

这里要探讨的是，辽西和内蒙东南成为龙文化的发祥地，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看法。今天可以说，中华文明起源，不是由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展，而是星星点点，四起燎原。在辽河流域，燕山地区，河套地区，阴山地区，都发现相当发达的古代文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巴蜀地区和珠江流域，也都有文明起源的历史遗存，与中原文明并非因袭模仿关系。各种文明交互影响，长期融和发展才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1986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对中国考古学会副会长苏秉琦教授的专访。苏教授作为考古学界泰斗，40年代就以黄河流域的发掘成就闻名遐迩。他对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基础。应当说，苏教授是黄河文明考古发掘代表人物之一。现在他本着科学精神评价北方文化的意义：

“苏老认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北方古文化。他说：‘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苏教授还指出：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所以特别强，‘这是与满天星斗一样的文明起源有密切关系的。’”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南北文化的碰撞交织融和，无疑是历史和重头戏，是学术研究的重头课题。无疑，中华民族融和与中华文化融和，是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但在

时间关系和心理基础上，却常有先后难易之分。民族融和可能有剧烈阵痛，有饱含血泪的碰撞和藏在心底的隐痛。历史时间的短暂时段，对个人却是漫漫岁月。比较而言，文化融和就来得自然和轻松。潜移默化中，融和的步伐不停前进。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器物、服饰、饮食、风俗、礼仪、宗教等等，在不知不觉中，改造陶冶人的审美情趣、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量的积累逐渐形成质的变化。这就是文化融和的特点和力量。而在文化融和中，文学艺术因为带有娱乐性质，以情感人，也就更容易被接受。鲜卑民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在大漠草原上培养出雄浑厚重的审美气度，影响了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的风格气度，受到后人的赞叹称许和效仿，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汉族诗歌的滋润，使辽帝王后妃中，使契丹女真蒙古民族中，出现了不少汉诗诗家，他（她）们的创作，使中华文学宝库的蕴涵更显深厚。胡地音乐登场，给中国词曲戏剧，平添多少情韵风姿，甚至可以说，促成了戏曲的成熟。

辽金元文学，上承唐诗余韵，中交宋词风彩，本身开创曲的繁盛期，又下启明清小说新貌，不但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更是文学研究的特殊重要对象。其中的文学个性风貌，审美心理特征，文学融和对文化融和民族融和的中介作用，都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三

辽金元文学有多种特点和多重价值。扼要而言，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在中国文学史上，辽金元文学的性质，属于一次内

涵深厚的文学交融的产物，因而出现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这次文学交融包括：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交融；南方文风与北方文风的交融；唐代风尚与宋代风尚的交融。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联系着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文学的价值座标，定位于审美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诸系统。因此，真实可信、感情深切、生动鲜明、个性突出等要素，成了衡量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准。当然，文学的民族风格、民族个性也是重要标准。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关系是可以理解的，文学价值高低与社会经济水平不可简单比附。马克思高度肯定希腊神话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是缘于这种道理。

辽金元三代文学，都可说是不同民族文学的结合。契丹、女真、蒙古民族在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下，文学简单粗犷，质朴真淳。他们受汉文学影响，追随学习的过程中，仍然保存某些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学特质。在民族文化交融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风格甚至语言风格，也给汉族文学带来影响。我们只要想想《敕勒歌》、《企喻歌》之类北朝少数民族诗歌曾倾倒历代多少文人，想想那种苍凉悲壮质朴刚健的风韵多么打动人心，就知道此言非虚。

各少数民族都出现了不少作家，能写出富有个性的汉诗。辽金帝王后妃如辽代圣宗、兴宗、道宗、萧观音、萧瑟瑟，金代海陵王、世宗、章宗等，汉诗都写得相当不错。元代耶律楚材、萨都刺等人，更卓然成家，毫不逊色于汉族高手。有些人的作品可能不合于传统的诗歌审美规范，如海陵王某些诗作就有失典雅，传统诗中，不用某些俗字，唐代诗豪刘禹锡不敢以“糕”字入诗，故后人曾感叹曰“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中